



郁蕊芬/文 乔勇/图

瑞典人李琳在中国已经生活了整整五年，以前去过哈尔滨、新疆、广州、云南、西藏，但大多数时间都消磨在北京，其间诸多的生活点滴，被她写进了《金发碧眼看中国》。此后，她移居上海，才生活了大半年光景，就确认这里是最适合她生活的城市，因为“上海很舒服，非常适合‘懒惰’的老外（居住）。”

道地的本地生活

说起李琳的“懒人”生活，就不得不提她的住所：新华路上，一栋绿树掩映的老洋房，充满绿意的独门院子。她和丈夫租下整个底层，然后分割成客房、主卧、书房、厨房、客厅、餐厅六部分，仿佛花朵的六片花瓣，而“花蕊”部分则是一片大理石砌成的花坛。

“我来这里看房子，只一眼就知道找对了地方。”对“懒人”李琳来说，从生活到创作，甚至是会朋友，她一整天足不出户，照样可以把日子安排得丰富多彩。

尽管，从油漆墙壁到搬运家什、内部装饰，劳心劳力，还免不了和装修工人争上两句，但事过境迁，李琳说“一切都是值得的。”自从来到中国，李琳找房只按一条标准：在特殊的环境下过道地的本地生活。她从未踏进市中心的高级公寓一步，在北京时住的是胡同深处的犄角旮旯，一到上海就直奔房屋中介，指明要住“特别的老洋房”。

老洋房的宽敞舒适与木制家具相映成趣，亮丽的墙面色彩与柔和的灯光和谐搭配，庭院里满满的绿意和空灵的鸟鸣直叫人陶醉。“这里充满了我喜欢的气氛和感觉，这对作家来说是很重要的，能够很快找到灵感。”每次，她写得有些倦了，索性搁笔，跑去院子里看看、转转，等又一次文思如涌了，才急急赶回书桌边。

“不在乎我”的邻居们

房子的地段再妙，装饰再精，终究只是硬件，对“懒人”李琳来说，还不足以让她安居乐业。“还需要有一个国际化的大环境，不必担心因为文化差异造成的（生活）不适应。”她说着格格笑起来：“上海就很国际化啦，（老外）就算不会说中文，不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也可以生活得很好、很舒服。这不是鼓励我们偷懒吗？不用心学习也可以过下去。”

记得当初像无头苍蝇般到处看房，每到一处，房东都能用英语和她聊上几句。李琳惊喜地张大了嘴巴：“很多老百姓都能说英语，怎么会这样？！”住北京胡同的时候，

李琳最大的苦恼就是难以和邻居们打成一片，不但是语言沟通不灵，出入胡同还得享受“注目礼”的厚待。“他们总是盯着我看，有时候还当着我的面议论，比如，这老外买了扫帚什么的。我知道他们没有恶意，可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走在羊群里的骆驼，浑身不舒服，心里也很别扭。”

在上海，“别扭”被“平静”替代了。李琳在家门口进进出出，邻居们熟视无睹，都懒得抬眼看她。“没有人在乎我，没有人盯着我看，真自由啊，很舒服。你知道吗，每次我走进弄堂，经过邻居的身边，我都会在心里对他们说：‘谢谢你们。’”

“平静”过后是“亲切”。街坊邻里中竟藏着那么多“涉外”人士，这更让李琳窃喜不已。“我认识一个开小店的上海女人，她说自己以前在新加坡住过，（她的）英语说得棒极了。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国外呆过，和他们聊天，我说什么他们都能理解，还能真诚地表达他们自己的看法。”李琳很珍惜这种交流，因为她和她的上海朋友们有着“共同语言”。

“拎得清”的清扫阿姨

邻居虽然“不在乎”她，但懂得维护她的隐私，李琳说，这是她竭力让老外都来上海定居的另一条重要理由。

老洋房的绿化交给物业管理处的一位阿姨负责，李琳家来了客人，阿姨总是刻意回避。“这对她来说，可能只是件小事，可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大事情了。她的服务非常敬业，她懂得考虑我们西方人的感受。”李琳对她赞不绝口。以前住在北方，她害怕听到敲门声，更怕敲门的房东硬要进屋和她聊家常。原来安排得好好的日程就这样被打乱了，李琳只能一遍遍地向房东解释：西方人不喜欢受人干扰，您要没事儿是不是上别处转转。

对这位阿姨，李琳已经生出了依赖感。“有时我随口问的事情，她都会记在心里，一有机会就帮我处理好。”采访当天，记者在李琳门前看到一个装满木炭的塑料袋。“这一定是阿姨帮我送来的呀。”几天前，李琳曾向阿姨提起，这个周末要约几个朋友来院子里烧烤，问阿姨附近哪里可以买到木炭。“你看，她看到我有客人在，就不进来了，把东西悄悄放在门口。”李琳话语间充满感激。

喜欢一座城市，很多时候是因为它的某些细节和姿态，李琳正是如此。她原先在上海一家英语培训机构任职，如今停薪留职，专心在家撰写瑞典文的新书，主题正是她的上海生活。眼下，初稿已经完成，她正和出版社协商进行第一轮修改，预计明年初，新书就将在瑞典上市。“我很希望新书可以被翻译成其他文字出版，现在有很多西方人都想了解中国，了解上海。我要告诉他们，老外在上海的生活有多惬意。”